

煙雨武夷山

在一個煙雨迷濛的日子來到武夷山。雨是霧狀的，雨霧中的武夷山，像蒙著一層神秘面紗，這給予了我更多的想像。一路上都在想，這樣的面紗倘若能永遠不被揭開該有多好，我們實在不缺乏對奧秘探究的所謂勇氣，我們更為需要的是，對大自然保留一份神秘感，對未知的事物懷著怕和愛。這也讓我想起不久前遊覽的雁蕩山，以及它的命名。據說古時那裡的山頂上有一個湖，湖中水草叢生，蘆花映帶，秋雁南飛時，常棲集在那裡過冬，人們於是把那個湖叫做「雁湖」，後來亦稱「雁蕩」。問了一些當地人，很少有親見山頂雁蕩的，主要是因為山太高太險。關於雁蕩的想像，於是變得更加神秘和富有詩意。在高山之巔，那些南來北往的大雁，究竟從遠方帶來了一些什麼樣的訊息？它們是未知的。它們在雁蕩山沉積了下來，最終於成爲山的一部分。

石頭上長樹，這是武夷山的奇觀，也是武夷山的常態。巨大的石，上有樹，下有水，山與水纏繞，水與樹遙相呼應，於是這巨石不再單調呆板，平添了若干靈性。樹長在石頭上，樹根與石頭之間該有著怎樣的一種默契？石頭內部的秘密，唯有樹的根是深知的。據說在妙高台上，有一株罕見的紅豆樹，到了成熟季節，山風輕拂，豆莢就會紛紛掉下，殷紅的豆粒於是滾落滿地。我覺得，這些殷紅的豆粒，帶著樹根的囑托與石頭的秘密，生長，成熟，然後悻然落地，重新又回到樹的根部，完成了一個不為人知的循環。可惜這樣的一個細節，被熙熙攘攘的遊人忽略了。

山路的台階是直接在山體上開鑿的，我們的腳步叩擊山體，像在與這山對話。攀爬累了的時候，駐足回望，水繞山，心中自有漣漪蕩漾開來。在山頂，偶爾聽到山蛙的鳴叫。我停下步子，在草叢遮掩的一灣水邊屏息靜聽，斷斷續續傳來蛙的鳴叫，祇聞其聲，未見其影，問及同行的當地人，果然是山蛙。這麼高的山，那蛙是如何來到山頂的？山上長樹，山頂有蛙鳴，這都是我不曾預料到的。我四處尋訪，最終也沒有見到那鳴叫的蛙。這山太深，水太長，聽得到蛙鳴，卻看不到蛙在哪裡。

遊山的過程中，心中一直有個疑問似乎沒有解開。我說不清這疑問是什麼，但我總覺得有個疑問留在心裡。上山，然後下

好話與壞話

人對人都有說好話的時候，也有說壞話的時候，但什麼時候該說好話，什麼時候該說壞話，這就複雜了。從人的本性上講，誰都愛聽好話，討厭壞話，我就沒聽說過有人說了別人好話，反遭辱罵的。

有些明明是硬道理的話都不敢直說。如觸龍說趙太后，極其典型。爲了你皇室的事操心還得先把嘴巴上抹滿了蜜，可見好心也不能把話說得難聽。

有醫學專家研究證明，人聽到別人說他壞話時生理上的化學反應特敏感，心情會出現晴轉陰，情緒上立刻進入難受難忍的狀態；聽到人家說他好話心裡舒服、高興，精神狀態爲之愉悅。這是人的本能吧。聽好話有利於身心健康，聽壞話不利於心理康健。

可你愛聽好話不行，因爲人的自私決定了人們是不會無緣無故地對你說好話的，別看說別人好話沒什麼物質成本，可人們照樣吝嗇。就連他人見面說聲禮節性的「你好」都那樣的不情願，就是違心地说兩句，「你今天的氣色真好。」「你今天穿得這麼漂亮。」好像自己就吃了大虧。

其實人與人之間祇要不是什麼原則的事兒，不是上下級的關係，我主張還是多種花，少栽刺，好話一句暖三春，人際關係之間的潤滑、和諧缺不得彼此多說好話。誰多說了，誰也能接受到好話的回報。

「說」與「有」

「說」與「有」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。明末清初的戲曲家李玉在《清忠譜·聞謔》中有話，叫「自古道，上說天堂，下說蘇杭。」這句話，在民間卻早已演變成了「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」八個字。其實，「說天堂」與「有天堂」有很大區別。說者，言也，是一種說法，一種主張。而有，則是一種客觀存在，既有形，又有名；既含物質，又含精神，是一種實在體。

說天堂在「說」。天堂到底是什麼樣子，誰也沒見過。不過，據《古蘭經》描述，天堂是妙不可言的：河水穿流其間，綠樹處處成蔭；既無烈日，又無嚴寒；既有蜜泉，又有乳河；既多水果，又多美女；人們親如兄弟，處處和睦和諧，是一個既有物質享受又有精神享受的永久和平之境。

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共產主義社會的描述是：人們「通過社會生產，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，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」。更重要的，「人們的頭腦和智力的差別，根本不應引起胃和肉體需要的差別；……『按能力計報酬』……變爲『按需分配』……換句話說：活動上、勞動上的差別不會引起在佔有和消費方面的任何不平等，任何特權」。這種描述，在一段時間內也被稱作「共產主義是天堂」。

無疑，宗教所講的天堂在天，是「上帝」所居住之地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描繪的共產主義天堂，則是在地，即人民群眾這個「上帝」所居住之地。天上是否有天堂，天知道；地上是否

十月豪飲菊花酒

有人說金秋十月是一個飲酒的好時光，對於這種感慨，我是有切身體會的。因爲早在20多年前，我的一位初中同學從鄉下帶來了幾壇米酒，是土製的菊花米酒。他當著我們面一壇一壇地打開了酒蓋，那酒香飄散開來，滿屋馨香怡人。當時我饞涎欲滴地說：這菊花酒度數低，憑咱們酒量，一口氣就能把幾壇小酒統統消滅了。那天我們一碗碗地大口喝起來，昏天黑地拚殺了三個多小時，幾罈酒空了，可是我們每個血性漢子無一倖免地倒在了地板上。

幾年後的國慶長假，我去了黔東南的苗村侗寨，那兒農家人釀製的醇香甘甜的米酒，加上冰糖、菊花、油調製成糯米烤酒，奇香誘人。平日裡當地人是捨不得喝的，祇有來了貴客，或者到了重陽，才拿出來開懷暢飲，所以此酒也叫「重陽酒」。那天我聆聽廬笙悠悠，在侗歌纏綿和侗舞熱烈中性情勃發，雖然知道那度數不高的苗鄉侗寨土製米酒的威力，但是我還是抵擋不了醇香甘甜的誘惑，一碗碗像喝飲料一般喝了起來。當十碗米酒下

盡孝也是享受人生

我有一位忘年交，發家致富之後回首往事，覺得這輩子最大的憾事是對父母沒盡到孝。年輕時闖事業，多次過家門而不入。發家之後忙於做大事業，也是將父母晾在一邊。直到父母雙雙去世，才覺得自己失去的不光是親人，更有盡孝的機會，爲此受到良心的譴責。因此，他退下來之後安心鑽研孝文化，告誡自己的後人：及時盡孝、努力盡孝，盡孝也是享受人生。

孝敬父母，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。盡孝之所以可貴，

山，臨別前再次回望武夷山，我驀然明白了，那個疑問原來是：一塊石頭，即是一座山。如此巨大的石，爲何卻沒有讓人感到笨拙和沉悶？水，是水賦予了這石頭以生機和靈性。九曲溪環繞武夷山，把36峰、99巖連成一個整體，不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。山水纏繞，使這幅圖畫有了動感，有了情趣，有了更多的風情和韻味。

竹篙輕點褐石，一葉竹筏載著我們，曲曲彎彎地順流而下。抬頭是山，俯首是水，山是厚重的山，水是清可見底的水，俯仰之間，皆是一種如入畫中的感覺。畫不是靜止的，是動態的，有一種神秘的感染力。坐在竹筏上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心中自有丘壑與波瀾。這樣的時候，山與水是理解你的，你也懂得這山與水，彼此並不需要什麼言語，祇需要靜默地坐著，順流而下，朱熹的《九曲棹歌》猶在耳邊，這個在武夷山生活和講學長達半個世紀的老人，他對這裡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都充滿深情，他的深情吟唱穿越了時光，穿越了山與水，在我的眼前漸漸地清晰和明朗起來。竹筏在林立的奇峰之間緩慢前行，沿途太多的神秘景象，很快又讓我內心的這份明朗變得模糊和沉重。我在想，七千多萬年前，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偉力，塑造了武夷山今日的丹霞地貌？

山是有語言的。山的語言，在石頭與石頭之間，樹木與樹木之間，或者在石與樹之間。祇是，作爲人類的我們，是否能夠聽得進聽得懂？我們已經習慣了太多的喧嘩與聒噪，對於山的語言，這種來自大自然的聲音，我們以之爲奇，卻未必能夠聽到心裡去。一顆懷著敬畏和熱愛的心，既是大山語言的秘密通道，也是它所期待抵達的目的地。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，是離不開這樣的「交流」的。遍佈武夷山的400多處摩崖石刻，不正是人與自然相互交流和對話的印痕？還有船棺，早在3800多年前，武夷山先民是如何把它們放置到數百丈高的懸崖峭壁之上，而且風吹雨打幾千年也不潰散，可謂千古之謎。這是武夷山先民崇尚自然，回歸自然，將生命托付給自然的一種表達。人類的所謂力量，是應該以對自然的敬畏爲底色的。如今，這樣的敬畏感已經越來越淡薄，征服自然的慾望越來越貪婪。在人類對大自然的所謂征服之中，面對武夷船棺和摩崖石刻這樣的千古之謎，仰望是我們唯一的姿勢。

所謂的壞話，也有兩種，一是惡意的傷人，一爲善意的批評。惡意傷人的話，連有裝包肚子的宰相都不愛容納，就別說芝麻官衙都沒有的凡夫俗子了。就是善意的批評也沒人愛聽。

這也來不得勉強，人家不愛聽你善意的批評我們就少說，尊重人家的感受。

但對那些擔負著社會角色的人則不同，他們的身份決定了他們是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者，他們與我們每個人都有著直接的關聯，批評他們不是批評他們個人，是問責他們的行政行爲。

若批評不能自由，說再多的好話就都沒了意義，那不過是阿諛奉承了。就像如今下級對上級送上的好話，局外人聽著就噁心。違心地说好話，是因為接受好話的那個傢伙有回報你好處的權利。聽別人好話也是有成本的，不回報別人送來的好話，你就會被好話給「捧殺」了。

做人做事，得有一份自知之明對好話，稀裡糊塗對壞話的心態才行。在這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，嘴巴早就「無組織無紀律」了，我們對壞話的態度，聽著就是了。那麼多網友說於丹、余秋雨沒文化，也沒人當真呀。真假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讓公民對公眾人物有說好話與說壞話的自由。

有天堂，人清楚。但人更清楚的是：天上不會掉餡餅，天堂不會自然生。要使「說天堂」變爲「有天堂」，最關鍵的，是離不開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。

信仰是精神。革命志士方志敏在《可愛的中國》中說得好：「敵人祇能砍下我們的頭顱，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！因爲我們信仰的主義，乃是宇宙的真理！」這個「宇宙的真理」，就是馬克思主義。實踐證明，馬克思主義不僅能讓中國「站起來」，而且能讓中國「富起來」、「強起來」。因此，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不僅不可無，而且不可變。實踐證明，對這種信仰，至信就會如神，至信就會無息，即便是身與草木俱朽，也會讓聲與日月並彰的。

信仰生力量。孫中山先生有一名言：「有了信仰，就生出力量」。當年的紅軍戰士之所以能在二萬五千里長征中，遇險不懼，遇山不退，笑對追兵，樂對天敵，是信仰的力量；當年的大慶石油工人之所以敢在荒原上一聲吼，要讓地球抖三抖，也是信仰的力量；當年的深圳人之所以能衝出姓「社」姓「資」的包圍，創造出「深圳速度」，同樣是信仰的力量。有了信仰，就會自覺在心，自行不休，如蘭生幽谷，不爲莫服而不芳；似舟在江海，不爲莫乘而不爲。

信仰出志氣。《後漢書·虞詡傳》中有這樣一句激勵人的話：「志不求易，事不避難」。要達此，惟有堅定信仰。有了堅定信仰，才會如紅梅：「不受塵埃半點侵，竹籬茅舍自甘心」；還會似墨梅：「不愛人誇顏色好，祇留清氣滿乾坤」。畢竟，堅信馬克思主義，就不會相信有什麼救世主，就不會以窮變節，以富易色，就不會爲利所惑，爲勢所屈，從而真正做到仰不愧天，俯不愧人，內不愧心。

肚之後，我任性亂步地走出了房門，十月夜晚的輕風拂面而來，我便四肢無力地「光當」倒地。之後的幾天旅程，我總感覺到酒意熏染著我的五臟六腑。當時同行的朋友笑著告訴我，黔東南的菊花米酒有一個調侃的名字叫「光當酒」，你就是在這種光當倒地的幸福中，品足了菊花酒的魅力和神奇。

其實菊花酒是有悠久歷史淵源的。菊花是「霜降之時」的茂盛之草，獨特品性成就了它高潔超然的生命素性。屈原筆下的「夕餐秋菊之落英」，說的就是素食菊花的花瓣。晉代葛洪在《抱樸子》中記錄河南陽山中人家，因飲了遍生菊花的甘谷泉水而人人延年益壽。另一位晉代大文人陶淵明有詩云：「酒能祛百病，菊能制煩鬱」。陶淵明退隱之後，不僅以詩酒出名，更以愛菊名冠古今。後人將賞菊與飲酒結合起來，力求達到陶淵明的人生境界和他超然瀟灑的藝術高峰。

記得有一年十月金秋，我突發奇想地寫了一首短詩《手執月亮》：我感覺自己佇立在一片菊香瀾漫的鄉野之上，月光如水，我手中高擎起一杯菊花美酒，我的身心在曠野上飄蕩，我的詩情在秋風中奔跑。

貴就貴在多年如一日的耐心加愛心。在與父母打交道的過程中，我們會得到與眾不同的關懷、理解與愛。參加工作，成家立業之後，絕大多數年輕人開始與父母分居。於是，每個雙休日，或者長假，一顆心倦了的心，往往會回到雙方的父母身邊，說生活，談煩惱，品一口最溫馨的家常菜，然後，在最信任的親人鼓勵和解釋中，身心得到沐浴和洗禮。

陪親人遛足，是人生的另一大享受。每年的公休假，我都要視放下退休的父母同行，陪他們走名山、游大川，開開眼界，舒筋活絡，讓他們在有生之年盡可能地踏遍曾經夢中神往的地方。在陪父母的過程中，我們的身心得到鍛煉，



車廂裡的信任

羊城公交車實行無人售票多年了。由於自動投幣箱在車前門的司機座旁邊，自從實行無人售票後，乘車都是前門上後門下。平時，人們會自覺地遵守這一規則。但在上下班高峰期，這一規則便常常被打破，因爲人太多，前門上不了，有的乘客便不得不從後門上。但這帶來一個問題，乘客投幣或刷羊城通怎麼辦？

於是，常常可以看到這般場景：從後門上車的乘客，總是自覺地將2元錢票款或羊城通遞給身旁的人，然後由其向前，經過層層人牆，接力傳遞到自動投幣機旁，祇聽「噹」的一聲，然後，羊城通又沿來路，準確返回主人手中。素不相識的人配合得默契而流暢。在密不透風的人牆裡，沒人抱怨，沒人拒絕，有的人實在騰不出手來，旁邊便會有人主動幫手。令人稱奇的是，在擁擠的車廂裡，這一傳遞過程竟不會有任何差池，更沒人在中途私吞別人的羊城通。要知道，羊城通在這個城市幾乎可當錢使用，不僅乘公交、地鐵、出租車可使用，許多便利店亦可刷羊城通，而且不記名，不設密碼，在一定

範圍近乎於電子貨幣。是什麼促成了公交車廂裡這溫馨的一幕？毫無疑問，是信任。一條信任的紐帶將司機與

乘客這群陌生人締結起了「利益共同體」。如果司機不信任乘客，擔心乘客逃票什麼的，那麼，司機可能寧可少拉幾人，關車門走人就是了。那麼，公交車便不能發揮最大的載人效益，乘客則不能及時乘車上班，遲到扣罰獎金也難免。後門上車的乘客及時傳遞投幣刷羊城通既是應盡義務，亦是對司機信任的回報。而乘客陌生人之間，當票款和羊城通從主人遞出那一刻起，信任的鏈條便開始延伸。我遞給你，意味著我相信你，不會拒絕這一小小的施助，也相信你會將這一信任傳遞下去。於是，一條信任的小溪在陌生人之間流淌著。

不要說，這信任的溪流微不足道。我們期待著和諧社會的創立，而信任正是和諧大廈的基石。日常生活中，信任則是潤滑劑，它能化敵視於消解，化矛盾於溫和。如果人與人之間，商家與消費者之間，政府與民衆之間，能夠多一分信任，少一分猜忌，多一分給予，少一分排斥，干戈化玉帛或許就在一個微笑之中。而有了信任的紐帶，整個社會機器的運作也定會變得高效而默契。

處，一是由畫作者無聊的心態，所見無不單調，沒有意思。二是暗藏作者看的順序，看一棵是棗樹，看另外一棵還是棗樹。沉悶的感覺呼之欲出。在新文學起步之初，這無疑是富於獨創性的。當然，這獨一無二不是沒有代價，那就是有目共睹的冗贅。簡練，並非對文學語言的唯一要求；有時重複是必要的。恰當，才是更高的境界。

不過，魯迅這一句的價值，不宜無限拔高。彫蟲小技而已，論白描的本領，這僅算起步；而且，並非全無瑕疵，句中的「牆外兩株樹」，如果把「兩株」刪掉，則更加切合人的視覺運作。你既同時看到「兩株」，那麼該馬上曉得都是棗樹，後面的「一株是」，「還有一株是」就不夠自然。

至此，想起魯迅另一句確屬妙手偶得、比棗樹精彩的警句：「晚籬寫得好非非是晚籬寫得好而已」（僅憑記憶，很可能不準確）。學生們讀過這首散文詩，不宜依葫蘆畫瓢，寫下：「今天家裡的飯桌上，一盤是青菜，還有一盤也是青菜。」「聽了這個故事，我的左眼流了淚，右眼也流了淚。」

鐘表迷

就盯著那根最長，頭頂有一個紅色箭頭的表針，看著它一圈一圈地轉，接受著它一下一下地敲擊。有時候會一待就是半天，我看著表表看著我。

表的上端有兩隻明晃晃的鈴錘，中間安裝著一個小錘子，也是明晃晃的。每當指針指向設定的時間時，隨著那小錘子搖頭晃腦地砸起，「嘩啦啦」一陣清脆的鈴聲，就會順著櫃頂向著整個屋子裡傾瀉，大有一發而不可收之勢。可是響過一陣後，小錘子的節奏開始慢了下來，

思想和境界也得到提昇。

是父母帶我們來到這個世上，又是父母將我們撫養成人，而我們如今行使的，又是父母當年的責任和使命。「養兒方知父母恩」，在陪伴父母的過程中，我們懂得了艱辛，明白了感恩。在左鄰右舍的稱讚聲中，我們的精神更是得到了充實。盡孝的過程，也是父母在他們的有生之年濃在我們身上的最後一層愛。他們希望給自己的子女留下更多更好的口碑，能夠在一個和諧共融的社會裡，幸福美滿地走完生命之旅，從這個意義上說，盡孝的過程，也即是我們享受人生的過程。

好好孝敬父母吧，趁自己年富力強，趁他們年事不高。珍惜相處的緣分，共享人生的快樂。



來，逐漸地慢，直到慢得一步都不想走，到最後「喀啦啦，喀啦啦」，喘幾口粗氣後就很不情願地停了下來。這時候我就想，這傢伙沒後勁，不如表針的腳步有力紮實。

隨著社會的發展，人們把馬蹄表換成了座鐘。同樣還是擺在櫃頂上，所不同的是座鐘下面吊一隻鐘擺，走起來是那種「匡才，匡才」的腳步聲，而且每到半點自動響一次，每到整點就幾點響幾聲。那聲音的確如同敲鐘，「當，當，當」，有一種金屬韻味，悠揚而深沉，但是卻沒有馬蹄表的那種一瀉千里的感覺，多了一分沉著，卻少了一種激情。到了後來，電子鐘稱霸家庭，這時的表從櫃頂走到了牆上，不管錢多錢少，也不管有用沒用，家家戶戶都買上一隻，掛在牆上最顯眼的地方，是爲了看時間，更是一種裝飾品。電子鐘好是好，時間掌握得精確，但是我從沒喜歡過它。電子鐘走起路來那個拖拉勁，總是提不起精神來；報點時儘管會響起悅耳的音樂，而我總覺得不夠味，缺少那種讓人想像的空間，沒有了催人奮進的激情。再說掛在牆上高高在上，目空一切，上不着天下不著地，華麗有餘而踏實不足。也不知道在哪年哪月，電子鐘終於退出了歷史舞台，人們買得少了掛得也少了，大多數人掌握時間靠手錶、靠手機，方便得很也精確度高。

現如今，馬蹄表、座鐘大都成了收藏品，而且年代越久價值越高。我喜歡馬蹄表之激情洋溢，也喜歡座鐘之踏踏實實，無論是「噹噹，噹噹」，還是「匡才，匡才」我都喜歡。有時候我就想，人生何嘗不和這鐘表一樣，也需要扎扎實實地走好每一步。